

法国地理学 思想史

〔法〕安德烈·梅尼埃



商 务 印 书 馆

法国地理学思想史

[法]安德烈·梅尼埃 著

蔡宗夏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地理学思想史/(法)梅尼埃著;蔡宗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592-3

I. 法… II. ①梅… ②蔡… III. 地理学史:思想史
—法国 IV. K9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 第 28984 号

FÀGUÓ DÌLIXUÉ SĪXIǎNGSHĪ

法国地理学思想史

[法]安德烈·梅尼埃 著

蔡宗夏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592-3/K·548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8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8 1/2

定价: 14.60 元

译者前言

在近代地理学发展史上,法国地理学占有光辉的一页。以“一代宗师”P. 维达尔-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法国地理学派,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着重大的建树。布拉什针对批判“环境决定论”而创立的“或然论”理论,E. 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的自然地理学原理,还有J. 白吕纳(Jean Brunhes)、A. 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等的人文地理学论著,都成为世界地理学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地理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我国老一辈地理学家都熟悉法国地理学派的学说。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们与法国地理学界的联系,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中国地理学家中通晓法语者为数甚少,因而对于布拉什等之后,法国地理学的近况和现状,我们就知之不多。难怪有位法国地理学家访华后,曾直率地对我指出过,为什么你们一谈到法国地理学,至今仍言必称布拉什和德马东呢?他们的重大贡献早已记载在地理学史册上,但他们代表不了现代法国地理学。这些话语深深地震动了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应该向国内同行全面地介绍法国地理学,这也正是一些地理界老前辈多次对我表达过的殷切期望。

自从1981年初,我初次踏上法兰西土地,到今天在巴黎寓所撰写这篇前言。我先后在法国居留已达八年之久。这期间经历了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读博士后,在法国科研中心任访问学者以

及在巴黎和外省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等不同过程。旅法期间,我得以参加法国地理科研、教学实践和野外考察工作;我有机会广泛结识法国地理界同行,从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到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耳濡目染,对法国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然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深知凭我目前对法国地理学的了解和所掌握的资料,要想撰写一本全面深入地论述法国地理学的专著,尚差得很远,谈何容易。不仅历史事件和人物纷纭繁杂,头绪众多,而且对当代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争论甚多,必须慎之又慎。更何况法国地理学界内部,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纷争向来就很激烈,连法国学者都认为属于应慎重涉足的“敏感”领域。

正在我为如何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感到为难时,一位法国同行朋友送给我这本 A. 梅尼埃(André Meynier)著的《法国地理学思想史》。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好书,确有如沐春风之感,心中豁然开朗:我何不先将此书译成中文,以尽早满足国内同行了解法国地理学全貌的需要呢!

《法国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从法国近代地理学的诞生,一直写到本世纪 60 年代末期,全面详尽地阐述了这段时间法国地理学思想的孕育、形成、演化和发展的全过程,并以令人信服的论据,作了阶段划分,论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书中涉及了大量的事件和人物,但作者不拘泥于事件和人物的平铺直叙,而刻意高屋建瓴,着重从纷繁的事件人物中,勾划出法国地理学思想演进的轨迹和主线。文章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严谨,详简有序;旁征博引,资料翔实。从而引导读者追循作者的笔触,对法国地理学思想的发展全过程作一番巡礼。传统的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主线,体系连贯,脉络分明;各分支学科亦有独到的论述,颇具匠心。给读

者以千枝俱全,枝繁叶茂的整体印象,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全貌便了然于胸。

作者还明确地指出,布拉什及其弟子对法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功绩卓著,但如果没有布拉什之前,一批没有什么名气的早期地理学家的工作基础,没有布拉什之后法国地理学界的群星灿烂,众星捧月,也不可能形成以布拉什为代表和核心的法兰西地理学派的。本书以相当的篇幅,向读者全面地展示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法国近代和现代地理学家,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和贡献,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作者对不同的学术派别和观点不带偏见,一视同仁。对传统地理学派,应用地理和现代技术学派的学术思想均一一详细加以叙述,对已故的或健在的知名地理学家都敢于公正评价。据说,本书出版后,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均反映良好,未见重大异议。作者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

本书作者,雷恩大学教授 A. 梅尼埃曾表示过,此书先写到 60 年代末为止。今后再版,接着续写下去。令人遗憾的是作者这个意愿未及实现,便与世长辞了!我注意收集和阅读此后出版的为数有限的同类书籍,感到它们都未超过本书的水平。有的篇幅很大,书名也曰《法国地理学思想史》但实际上是地理学史论文集。其中虽有一些好论文,但只能给读者“管中窥豹”的印象。有的则过于“厚古薄今”,回避了对当代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比较之后,我仍然选择本书翻译。尽管出版年代老了一些,但作为史书,仍完全有翻译出版的价值。

诚然,从 70 年代至今,20 多年过去了。法国地理学仍在继续发展中。如何弥补这一段空缺造成的遗憾呢?为此我曾约请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史专家,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教授 P. 克拉瓦尔

(Paul Claval)续写 70 年代之后的部分。克拉瓦尔教授欣然同意,并认真撰稿完成。他将 70—90 年代划为一个新时期——“重组时期”,作为本书第四章,以求与前面各章的划分体系一致,衔接呼应,可见其治学之严谨。在这里,我谨向克拉瓦尔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敬意。同时,我对法国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也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热情地理解和支持了增补章节的特殊处理方式。

本书翻译和自校工作,都是在旅法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翻译工作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周末和节假日,为我排遣了许多旅居海外的孤寂和乡愁,带来无穷的乐趣。事实上,旅居法国给翻译工作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例如图书馆有各种法语工具书、百科全书可供参考;遇到疑难时,可随时就近向同事或专家请教。本书涉及之面如此广泛,人物事件自古至今,地理各分支学科包罗万象,还有许多专业术语,民间俗语,这些翻译中的难点,如果没有法国同行朋友的指点是难以想象的。我在翻译过程中随时随地请教过的人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这里我谨向以下法国同行友人,特别致以谢意,他们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许多具体帮助(以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Victor Bouvies, Michel Bruneau, Paul Claval, Doryane Kermel, Pierre Larivière, Michel Pouyllau, Jean Renard, Pierre - Jean Roca, Anahit Santana, Philippe Schar, Olivier Sevin, Thérèse Wang - Vinant 等。

同时,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国内地理学界许多老一辈专家和同辈学者的关怀和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吴传钧、赵松乔、高泳源、杨吾扬、郭来喜、文云朝等先生,没有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我也难以在独居异乡的心境下,坚持完成这项翻译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周舜武和包森铭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我也是铭记不忘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译者限于水平,译文难免有错误与疏漏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赐正。

译 者

1996 年除夕于巴黎寓所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诞生时期(1872~1905 年)	4
一、1872 年的转折	4
二、创作的繁荣	7
三、维达尔的使命	15
四、维达尔思想的影响	29
第二章 直觉时期(1905~1939 年)	37
一、学术空气活跃	37
二、地貌学的飞跃发展	46
三、人文地理学的探索	66
四、区域专题研究的成就	99
第三章 分化时期(1939~1969 年)	121
导言 地理学研究的新条件	121
一、对数量的关注	124
二、对自然科学的关注	131
三、对现象过程的关注	138
四、对地图学的关注	152
五、对人文经济的关注	156
六、对实效的关注	173
七、对竞争和才能的关注	194

八、世界地理学	212
第四章 重组时期(1969~1994 年)	219
一、新的社会背景	220
二、体制方面的变革	221
三、新手段和新方法	222
四、自然地理学的独立性增强	224
五、地理学研究以人和社会为中心	226
六、空间布局、世界一体化和现代性危机	237
总结	239
参考文献	245
法中人名对照表	249

绪 言

本书作者编写的意图,既不想开列地理学著作清单,也不想为地理学家登榜题名。二百来页的篇幅,要叙述地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数家珍的。一项简单的人名、著作一览表,就足以占满篇幅。

本书着重于揭示地理学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而避免历数著作作者姓名。诚然,叙述过程中不能不举例子,学者和著作的名字还是会提到的。我们将尽可能选择最有特色的,但未必一定是最杰出的加以介绍。原则上,我们对其学术价值不明确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见。有时在阐述某些方法论的争论,或评注某些事实的结果时,我们也会流露出自己的倾向。我们将提出可靠的论据,而不指责任何相反的观点。

一部历史书不能没有其编年史范围。本书采用的大的编年时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严格的年代划分。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思想可以跨越几个时期;某些相互交错,甚至年代顺序前后颠倒亦不足为奇。本书各章标题下所注明的起讫年代也只是一种大致的界限,并非严格的约束。

有几部很好的著作,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法国地理学史。不过,有的写得太简单了,例如知识丛书《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中,勒内·克洛泽的著作《地理学史》(René Clozier, L'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有的只涉及地理学的某一方面,例如保罗·克拉瓦尔

(Paul Claval)关于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的出色研究。他着重于阐述法国地理学的演进与国外地理学,特别是与英语国家的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地理著作和教材在开场白中,也包括有纪年史叙述。即使大学生指南和大百科全书中的条目也同样如此。本书的编写宗旨则明显不同:我们力图总体地研究地理学,而不是它的某一分支学科。不过,我们仅限于论述有关法国的内容,因为这一题材已经够宽广的了。

为了撰写本书,作者进行了资料研究,发现有两个事实,至今还不十分明朗。其一,关于某些地理学家和某些地理学著作的“神奇”定论业已形成。可是,当读者阅读本书时,将会发现挥舞这支“神棒”的,既不是维达尔-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也不是德马东(de Martonne)。^①人们在提到他们时,往往与一些伟大的理论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这些理论早已存在了。诚然,他们是整个地理学思潮享有盛名的象征,可是他们本人的威望以及他们教学活动的影响,常常使人忘记了他们的一些同辈和前辈,这些人往往也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更忽略了为数众多的小人物,没有名气的和没有头衔的人。没有这各种人物的作用,就意味着没有一切可能性。其二,纯地理学思想总是与当代的思潮趋向和各种形式的哲学和教育相联系的。因而我们对此不可能只字不提,否则就会失去阐述的重要论据。我们的意思完全不是说,地理学家必定都阅读和研究过他所处时代的哲学著作。这一点通过纯传记研究就可以确知。重要之处在于知道地理学家和哲学家往往同时以类似的方式

^① Vidal de la Blache,全名为保罗·维达尔-布拉什。维达尔-布拉什系姓,旧译维达尔·白兰士,亦简称为维达尔;de Martonne,全名为埃马纽埃尔·德马东。德马东系姓,旧译马东或马东男。——译者

去推理论证,而他们却常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历史学家可以不受他所处的任何时代和国家的局限的话(这一点仍有很大的争议),那么地理学家必定受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影响。

第一章 诞生时期

(1872~1905 年)

现代地理学究竟始于何时？大多数作者对此缄默不语。他们明确地指出，在德国，洪堡(Humboldt)和李特尔(Ritter)创建了现代地理学，尔后由维达尔-布拉什将其引进法国。然而，洪堡和李特尔两人都于1859年逝世，而维达尔的名著只是到1900年前后才问世，这期间的间断如何加以解释呢？

一、1872 年的转折

在此时期之前，法国地理学并非完全不存在。从第一帝国时起，已有一位被放逐流落到法国的丹麦人马尔特-布伦(Malte-Brun)曾编纂了一部《地理大全》(Géographie universelle, 1810~1820)，且不失其价值。不过，这部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再再版和被抄袭，因而竟使以后的研究陷入停滞和僵化。在此之后，“地理学会”于1821年在巴黎宣告成立。学会促进了探险考察的迅速发展，但它在公众中并没有多大影响。当时有各种定期出版物，但周期长而寿命短。马尔特-布伦于1808年创办的《旅行杂志》(Journal des voyages)便是一例。在当时教育完全无视这门学科的情况下，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境遇吗？充其量在历史学中有点地理内容，即所谓的历史地理学。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历史地

理学呢？仅仅是一些关于边界和行政区划沿革的研究而已。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学学士的教学大纲中，关于古波斯帝国的省^①和罗马皇帝迪奥克莱蒂安(Dioclétien)^②的省的内容分量很重。然而不久，维克多·迪律伊(Victor Duruy)在一些施行专门教育的新型中学(该校不设拉丁文课)，悄悄地开设了数小时地理课。总之，当时统治阶级对地理学教育是十分轻视的。

大家都知道，皇家军队的军官们是何等轻蔑地图。一位作战部长曾在议院抽出他的佩剑扬言：“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地图！”(可是此人却非常重视护腿罩上的纽扣，一颗也不少)。只有少数学者对地理这门学科感兴趣。他们发出紧急呼吁，结果无人予以理睬。当时有一位优秀的地图学家和探险史学家维维昂·德圣马丁(Vivian de Saint Martin)，他每年都编纂出版一本《地理年刊》(1863～1875年)(Année géographique)，系现今刊物《国际地理学文献》(Bibliographie internationale)的前身。他曾在此刊物上发出悲叹：“地理学研究薄弱，对于民众教育来说是一种可悲的征兆。”他在评论当时行时的书籍时指出，所有这些书都是“无休止地罗列地名、专名；枯燥令人生厌的论文习作，全然不谈及思想观点和激发人的智慧”(1866年)。他只提到两种优秀著作。一是拉菲(Raffy)的《地理选读》(Lectures géographique)(这是一种文集，主要收集探险家和旅行家的作品。在当时不愧是杰出的著作，现今已找不到与其相似的著作)；另一是朱尔·韦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

由于战争停刊了两年的《地理年刊》于1872年复刊，而且调子

① satrapies, 古波斯帝国的省，由省总督管辖。——译者

② Dioclétien, 迪奥克莱蒂安，罗马帝国皇帝(公元284～305年)。——译者

马上就变了,阴沉丧气的低调被“凯旋曲”所取代。一个崭新的地理学进展时期已经到来了。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必然的规律。早在战争之前维维昂·德圣马丁就已试图提醒人们注意,在地理学研究方面德国强于法国,这意味着一种危险。大家都还记得他的一句警言:“正是德国小学教师,才使战争赢得胜利。”特别是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教育。法国如果不向她的子弟强化灌输这两门课程的深博知识,就不能重新振兴起来。随之,人们见到官方措施也大大加强了。政府委任E.勒瓦瑟(E. Levasseur)和伊姆利(Himly)负责编制中等学校的地理教学大纲;勒瓦瑟还被授予法兰西学院^①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统计学教授。政府在中学(包括高中和初中)优等生会考中设立了“地理奖”;在政治学院^②开设了地理和统计课程。国民教育部长朱尔·西蒙(Jules Simon)紧急指示各中学校长,立刻组织地理学教育,不必等待正式教学大纲的颁布。他于1872年10月1日签发的通知,值得镶入镜框,悬挂在所有的地理研究机构里。因为这项通知确立了地理考察的地位。当时名曰“地形学远足”,包括军用地图^③的入门研究,草图的绘制、植物研究、参观历史名胜等内容,这对于学生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极有益的。在一年中至少应有3~4次较大的远足考察。后来历任部长和督学也都多次推荐这项实践,不过始终没有在法国真正普及开来。

由此可见,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将会带来地理知识和地

①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亦译为法兰西公学, 系法国最高学府之一。——译者

② 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政治学院, 系法国著名高等学校之一。——译者

③ carte d'état-major, 军事参谋部地图。指由参谋部绘制的1:80 000的法国地图。——译者

理学思想的进步吗？

二、创作的繁荣

气氛——第三共和国的头五年不仅反映了灾难之后的艰难觉醒，而且相应于科学思想史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正是由于巴斯德之观点的胜利，1872年以后，人们不再争议了，谁也不再强调“自然发生”原则了。过去最疑难的疾病，如今也可以用细菌来加以解释。于是，决定论观点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人们都明白，一切现象的原因都能够找到，并且可以建立自然的法则。科学不应该再满足于描述和分类，而应该去解释现象。

然而，一些哲学家几乎立刻惊恐叫喊起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这是对的；但是对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可能统统掌握。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偶然性因素。具有同类原因的事物，也可以发生与往常不同的情况。由此可见，在“因果关系”的概念上，还必须加上“或然性”概念。“或然性”这一词汇在伏尔泰（Voltaire）和费纳隆（Fénelon）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并由于埃米尔·布特鲁（Emile Boutroux）的论文《论自然法则的或然性》（1874年）（*De la contingence des lois de la nature*）而成为高雅的字眼。于是，地理学的理论格架已具雏型：因果性确实存在，到处可见；必然性则不存在。

1872年，“挑战号”启航去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海洋考察；格里马尔迪（Grimaldi）岩洞^①的发现，“宣告了史前英雄时期的结束”（M. 索尔语——Max Sorre），从此提出了人类历史的确切起点。

① Grimaldi，意大利岩洞名，在那里发现史前人类，称为格里马尔迪人。——译者